

新闻业务

XINWEN YEWU

活叶版

57

总 1606 期

1978年12月12日

新华通讯社编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目 录

- 事实是新闻的唯一源泉..... (1)
- 引语可否编造..... (3)
- 从“骑骆驼”想到“斗牛图”..... (5)
- 吕淑湘同志谈新闻语言的准确性..... (5)
 - “今天”小议..... (7)
 - “继续新长征”的说法欠妥..... (7)
 - 建议开辟我国测定国际地震的报道领域..... (8)

事实是新闻的唯一源泉

占 焜

新闻和事实的关系，本来就像万里晴空一样明朗：新闻是事实的反映，事实是新闻的唯一源泉。

但是就连无产阶级新闻学的这样一个常识问题，也被“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他们炮制了“事实服从路线需要”的谬论，否定事实是新闻的唯一源泉，而把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作为新闻的唯一“源泉”。这种新闻“理论”，在哲学上是唯心的，在政治上是假左真右的。这是一种鼓吹可以打着革命旗号造谣的反动“理论”。“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时候，随心所欲地制造“新闻”，强奸民意，炮制假典型骗人，肆意歪曲毛主席的教导，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人民群众给姚文元加上了个最合适不过的帽子：“谣文源”。

真实性问题，是新闻工作的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对这个问题都有过重要阐述。早在一八四二年，马克思在他著名的论文《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中就指出：区别“好报刊和坏报刊”，要看你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还是“根据希望来

描写事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因此，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要求新闻必须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四人帮”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的世界观是唯心论，他们的主张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是不得人心的，所以他们不歪曲事实就不能过日子。这是他们鼓吹“事实服从路线需要”的根本原因。“事实服从路线需要”也者，按着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随意歪曲事实之谓也。如今“四人帮”已经垮台了，他们随意编造的这个新闻“理论”也破产了，但是这个谬论的流毒还在害人，必须彻底肃清。

有的同志认为，在新闻报道中，事实服从错误路线的需要是不对的，但是事实服从正确路线需要则是对的。他们问道：新闻的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为什么事实不可以服从正确路线的需要呢？

对于这种看法，要加以分析。新闻要宣传党的路线，说的是新闻的任务。新闻来源于事实，说的是新闻的源泉。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那些主张事实可以“服从”正确路线需要的同志，实际上是把新闻的任务同新闻的源泉混为一谈了。必须明确：人民群众的三大革命实践（或事实）是第一性的；而路线或新闻则是实践（或事实）的反映，是第二性的。这是个存在和意识、物质和精神、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绝对不可颠倒。

正确路线来自群众的革命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同时又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宣传正确路线和宣传群众的实践（即事实）是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绝对不需要歪曲事实来“服从”正确的路线的需要。马克思说：“事实不排斥思想，正如思想不排斥事实一样”。只有“四人帮”那样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家伙，他们的反动立场才本能地要歪曲、捏造或排斥客观事实。

由于“四人帮”的毒害，至今有些同志写新闻有时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主观框框出发，而不从客观事实出发。他们喜欢带着主观框框去套事实，符合框框的就要，否则就不要。有的为了主观需要甚至不惜歪曲事实或编造“事实”。

这样做，结果之一就是新闻报道虚夸失实。

最近，《解放军报》读者来信揭发的假报道《小画家有了用武之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篇假报道的作者不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而是先想好“点子”，定了“路子”，然后去找例子。例子套不上，就东拼西凑，捕风捉影，随意编造。有位了解事实真相的读者说：“看来，看报不得不多长个心眼，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这就是这种假报道的后果。俗话说，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假报道严重损害了党报在群众中的威信。我们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要从客观事实出发，探求它的规律性，反映事物的本质。尊重事实，不讲假话，这是无产阶级新闻的起码要求，也是无产阶级新闻的力量所在。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线，破坏了真实性，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新闻存在的基础。

有些记者、通讯员手里掌握着一种“万能事实”。“妙”就“妙”在作者根据主观需要，可以随心所欲地用它来“说明”各种不同的问题。比如，在这些人的笔下，一个单位的生产任务完成得好的原因可以千变万化：一九七四年是由于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是由于整顿企业，一九七六年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成绩，而在一九七七年却成了批判“四人帮”的硕果。总之，看风使舵，主观上需要贴什么政治标签，就贴什么政治标签，根本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想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什么问题。这样的新闻，又有多少真实性可言呢？

有的记者只听领导机关的意见，根据领导机关的需要来报道，不深入群众作调查。有的领

导机关误把工作一般、甚至很坏的单位树为先进典型，他们也跟着报道，当然会造成报道失实。

从主观框框出发，后果之二是新闻报道千篇一律。

在新闻工作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报纸上突出地刊登了一些重要新闻以后，同类型的稿件就大量地涌进编辑部。这些稿件主题一样、角度相同、事例近似，使编辑难以处理。编辑部这时需要的是深入一步的报道，而这些新闻却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比如，报纸在头版发表了一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消息以后，同类型的稿件就象雪片一样飞来。不少稿件的导语都是某某单位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内容大同小异，大致包括这样几条：第一，对知识分子原来有错误看法，经过学习，认识到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第二，解决学非所用的问题，百分之多少的知识分子回到适当的岗位工作；第三，重用他们，多少人被提拔为工程师和科室领导职务。编辑们把这类稿件，称做用“标准零件”组装成的“标准稿件”。有的同志开玩笑说：我们国家机械工业的标准化还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而新闻的“标准化”却轻易地提前实现了！标准化的机械零件，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而“标准化”即一般化的新闻稿件却只能令人头疼。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是作者不从实际出发，用主观的框框去套客观事实，用一般去代替个别，用普遍性去代替特殊性。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事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抓住特点，提炼主题。仍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报道为例，《他们能提为工程师吗？》（见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就跳出了一般化的框框。记者从四名有政治历史问题和家庭社会关系复杂的技术员被提拔为工程师写起，引出了争论的问题：这样做是不是“重用坏人”，是不是“不讲阶级路线”，宣传了历史问题主要看现在、家庭出身主要看本人的政策。《石油部提拔四位专家当副部长》（见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也是一篇好的报道。记者根据掌握的大量事实，提出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个问题：由于林彪、“四人帮”散布的“臭老九”和“白专”的流毒尚未肃清，影响了大胆提拔和重用技术人材；有的地方厂长之中无内行，内行之中无厂长。这篇消息用提拔四位专家当副部长的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人们会进一步得出结论：既然他们当中出了副部长，当然还可以出厂长。如果不了解实际情况，只是有个主观的框框，一定写不出这样针对性很强、发人深思的新闻。

科学家巴甫洛夫说过：“鸟的翅膀无论怎样完善，若不借空气支持，是不能使鸟体上升的。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空气。没有事实，你们永远也飞腾不起来”。这段话对新闻工作者来说，也是很有教益的。事实是新闻的唯一源泉，事实是新闻工作者的“空气”。我们切不可忘记新闻工作这开宗明义的第一章。

〇

引 语 可 否 编 造

上海分社 张少峰

《新闻业务》第四十七期刊登的《自己要好好动脑筋》一文，介绍了记者、编辑对《沧海桑田话龙江》一稿中的引语进行加工的过程，并且认为这样增强了“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性。我感到这种所谓加工，实乃编造。由此，想到一个问题：新闻报道中的引语可否编

造？

新闻报道是对客观事物的如实反映。报道中的一切事实，包括引用采访对象的话在内，丝毫也不能虚构。但《沧海桑田话龙江》一稿的作者在引用公社党委制订的“四个一”规定时，却在“备好一本劳动手册，”后面加上了“到哪里都不脱离劳动。”到了编辑手里又被“加了工”，把“备”字换成了“写”字。

作者写了这一制度的四句原话。既是“照抄”，那就不应改动一个字，更不能添三加四。

另一处编造是，原来的引语是“农民不和土地、石头打交道，难道粮食从天上掉下来！”编辑并没有亲临批判会听到社员发言，居然敢在“不和土地、石头打交道”之后，添上一句“还算什么庄稼人”。这不明明是在编造吗？

添补、加工引语这种违背新闻真实性的做法，并非出自《沧海桑田话龙江》一稿。此类事例俯拾皆是。不久前，我采写了《实现现代化中的上海青年工人》一稿，其中写了一位刻苦学技术的青年女工，讲她从母亲在旧社会受到帝国主义欺压的事实中，具体地懂得了落后要挨打的道理，引了她说的一句话：“把国家建设得富强，是老一辈工人的愿望，也是我们青年一代的理想。”编辑也许认为这句话的思想境界不够“高”吧，就在句首添上了一番话：“为了谋求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幸福”。那位女工说得挺好嘛，何必再要编造呢？报道中引用的每个人的话都应有自己的个性，这种“为了革命”的共性话只有寓意于个性之中才不落俗套。贴标签式的办法最省事，贴在哪里都行，吃饭、走路也未尝不可冠以“为了革命”，但这岂不可笑吗？现在，大家对随意加工引语，已经习以为常了。每天在报上见到的那些“大家说”、“他们表示”、“认识到”、“体会到”，等等，又有多少不是我们记者、编辑加上去的呢？

当然，我不是说引语绝对不能改动。如果从语法、修辞、逻辑上对引语进行整理，是完全应该的。这同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根本是两码事。

说假话，大家都深痛恶绝。但是对于随意加工编造引语，不少同志却认为这是为了“提高思想性”，“增强生动性”，是“理所当然”的。殊不知，编造引语实质上就是说假话。这种现象如不纠正，势必损害党的宣传事业的声誉。前几年，“四人帮”就常常借“群众”之口贩卖他们的黑货。上海分社一九七六年采写的大批错误报道中，那些“你说”、“我说”“大家说”之类的大段引语，都是从“梁效”、“罗思鼎”的黑文中抄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不少同志跑来找我们，要澄清事实，证明那些谬论不是他们说的。这种沉痛教训难道不值得记取吗？但是，我们一些同志甚至领导同志对此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毒不知毒，不好，知毒不消毒，更不好。

编造引语的祸根在于“四人帮”。另一个原因就是有些同志总以为人家的话不如自己的准确、鲜明、生动，非要改得合乎自己的口胃不可。其实有些话经过“加工”，也好不了多少，甚至不如原话。希望编辑今后尊重事实，报道中好端端的话，就别去“加工”吧。

最后有必要声明的是，我并非要否定《自己要好好动脑筋》一文和《沧海桑田话龙江》这篇报道。肖辉家同志在文中提出，记者要加强责任感，克服惰性，应该把“让编辑去动脑筋”，换成“自己要好好动脑筋”，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认真负责，注意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正是提高报道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必须考虑到，怎样下功夫都不能违背新闻真实性，这是前提。本文想说的正在于此。

从“骑驼照”想到 “斗牛图”

内蒙古分社 傲 腾

我国宋朝著名文学家苏东坡是个才气横溢的人，善写文章，也爱字画。据说有一次，一位朋友画了一幅《斗牛图》，送上门来让他欣赏，苏东坡又请了一些画家一起品评，都说画得好：两头牛瞪着眼，鼻子里喷着白气，尾巴高高翘着，牛角抵在一起。正在这时，苏东坡的家童送茶来，偷看《斗牛图》一眼，“噗嗤”一声笑了。苏东坡怒不可遏，喝问其所以。家童答道：“此画画错了。”画家们问错在何处？家童说：“黄牛抵角，是紧紧夹尾于屁股沟的。”苏东坡又问：“你何以知道？”家童说：“小人出身牧童，在家曾有几年牧牛，常见黄牛打架。”画家们一时都瞠目结舌，面显愧色。

这事发生在宋朝苏东坡的客厅里。我再讲一件当今的事：七七年第十期《民族画报》刊登陆元国《边防民兵》照，拍的是两个秀俊的蒙古族姑娘穿着粉红色袍，头戴黄、绿纱，荷枪骑在毛绒绒的骆驼上，手指前方，笑逐颜开，可谓生动、美观矣。今年国庆《人民日报》将此图片展出在人流似潮的王府井大街宣传窗中。一天，我到王府井大街买书，过此处与观众共赏，恰遇两位草原来的蒙古族青年，一见此“照”，相对发笑，并且私下用蒙古语说：“骗北京人咧。”我问为何？他们说：“看姑娘穿着是盛夏服装，可是看驼毛绒必在严冬，因为夏天骆驼毛是掉光了的，夏天的姑娘骑冬天的骆驼岂非笑话？人们一听，哄然散去。我作为本报记者，十分内疚。看着这幅《骑驼照》不由得想起《斗牛图》来。两件事虽隔千载，何其相似乃尔！两张画使我悟出一个道理：我们搞新闻报道，不深入群众，了解生活，熟悉生活，而是“想当然”，道听途说，凭“合理想象”去写去拍照，这样势必弄得张冠李戴，漏洞百出。这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大戒，应牢记之。

* * ~~~~~ * *

吕淑湘同志谈新闻语言的准确性

新闻语言的首要要求是准确。这里所说的准确，应当作比较广义的了解。比如读者希望知道的事情，你不交代清楚，也就是不准确。常常看见农业方面的报道，上来就说某某公社，也不说哪省哪县，读者是感觉不满足的。

还有，《人民日报》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第六版《非洲三国友谊行》，第一句是“七月底到八月中旬的非洲，阳光灿烂，繁花似锦……”。按说非洲是个相当大的地方，北起北纬37°5′，南至南纬35°，差不多一半在北半球，一半在南半球，好望角附近的季节跟地中海沿岸恰好相反。标题里的非洲三国是索马里、加蓬、喀麦隆，都在赤道附近，这里一年四季都是“阳光灿烂，繁花似锦”，不限于七月八月，可是笼统地说整个非洲在这个季节都是这般模样，就不太准确了。

② 准确性特别表现在前后照应的场合。《人民日报》今年九月三日第一版有一篇《七种国

产手表降价出售》：

降价的七个牌号的手表是：红旗牌、广州牌、延安牌、蝴蝶牌、海狮牌、山城牌、金锚牌。其中丹东产的红旗牌、广州产的广州牌、西安产的延安牌、上海产的海狮牌四种十七钻全钢三防手表，每只零售价由一百一十元降为九十元，重庆产的山城牌、青岛产的金锚牌十七钻全钢三防男表，每只由九十元降为八十元。

不大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蝴蝶牌手表是哪儿出产，售价由多少降到多少，没有交代。又如《人民日报》今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五版《萨瓦河畔新家园》里边说：

……居民中包括……四千多名大、中、小学的学生，三千多名学龄前的儿童。

在“萨瓦”地方共同体，有一所八年制学校。共同体的三千名七至十五岁的学龄儿童全部就地入学。……

离这所学校不远，便是一所幼儿园，共有四百多名三至六岁的学龄前儿童。

……又指着远处的一大片空地，说，这里，我们将兴建一所中学，一所托儿所，它们将同已有的小学、幼儿园“配套成龙”，形成初步完成的教育网。

这里有两个问题：（1）学龄前的儿童共有三千多（这数目大概不会错，跟四千多大、中、小学学生成比例），可是这幼儿园里的三至六岁的儿童只有四百多，难道三岁以下的儿童有二千六百多吗？这不近情理。大概幼儿园不止一个，那八年制学校附近的幼儿园只是其中之一。如果加一句“这样的幼儿园还有好几所”，就不至于引起读者的疑惑了。（同样，那将要兴建的托儿所大概也不止一所，幼儿园和托儿所都不宜于太大。）（2）前边说“八年制学校”，后边说“小学”，是不是一回事？看上去是一回事。那就不该前后名称不一，引起疑问。

话说得不清楚，叫人不好理解，或者可以有两种意思，也都是违背准确性这个原则的。还拿上面提到的《萨瓦河畔新家园》做例子。那里有一处说：“共同体开设了一所为期半年的青年业余政治学校……”这“为期半年”是说这个学校只办半年吗？大概不是这个意思，是一期半年的意思。可以就用“半年一期”，或者“半年制”。

另一个地方说：“这么多住宅大楼、公用设施、集体福利事业以及日常管理费用是怎样筹集的呢？”费用可以“筹集”，大楼、设施、事业都不是可以“筹集”的。作者的意思是，兴建住宅大楼要有经费，兴办公用设施和集体福利事业要有经费，日常管理也要有经费，这些经费是怎么筹集的。

又一个地方说：“为了解决‘双职工’的学生生活照顾问题，学校允许这些学生在校食堂就餐，并且专门安排老师进行课外辅导。”这里，“双职工的学生”不好讲，“生活照顾问题”太罗嗦，课外辅导似乎也不属于生活照顾的范围。这句话可以说得简单明了：“为了照顾双职工的子女，学校允许他们在学校食堂就餐；并且安排老师在放学以后辅导他们。”

（编者注：此稿原载《人民日报》报刊通讯，因举例大部同我社报道有关，故转载于此。）



“今天”小议

宁 远

《邓副总理到达东京受到热烈欢迎》这条消息，是写得比较好的。要挑毛病，稿中“今天”两字出现五处，用得太多了。

在报道中写上“今天”这个时间概念，一般是为了向读者交代事实是在当天发生的。如果这一点在报道中本来就很明确，那就不必再反复地写“今天”了。且看这条消息中“今天”的用法：

第一处是报道邓副总理应邀在“今天”下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东京。这个“今天”当然是不能省略的。

第二处是在谈到专机进入东海上空后，记者写道：“今天，太平洋上碧空万里，波光滟滟。”太平洋上不是云海沉沉而是碧空万里，这是随行记者目击的情景，完全用不着再交代这是“今天”的情况。这一处“今天”明显可以省去。

第三，记者报道专机在羽田机场降落以后，紧接着又交代：“今天，羽田机场飘扬着中日两国国旗”。机场上飘扬着两国国

旗，自然是当时情景，完全用不着再交代“今天”。

第四处是引用邓副总理的话：“几年来的愿望，今天实现了！”第五处是记者在背景中讲到“今天”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这个“今天”是用来泛指当前而不是表示“当天”的意思。看来第四、五两处“今天”不能省。但上述五个“今天”，可以删去二个。

“今天”这个时间概念用得不当，似乎是外事消息的一个通病。十月二十四日发《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到京》消息的导语中交代洛佩斯·波蒂略总统今天乘专机到达北京后，接着是一句和邓副总理到东京稿相同的句式：“今天，首都机场上空飘扬着中墨两国国旗”，以及另一句：“今天，到机场欢迎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和夫人的还有……”。又如，同日发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产汽车公司座间工厂》稿的最后一段是“今天，陪同邓副总理到工厂参观的有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等。”这三处都是把“今天”放在一个自然段的开头，并用逗点把它同下面的句子隔开，含有强调的意思，特别显眼。其实，这三处“今天”用得都无必要。为什么要强调没有必要出现的东西呢？我们不能因为顺手写惯了就不去推敲这两个字在句子中的用法是否妥当。

*

*

*

*

“继续新长征”的说法欠妥

陈 淑 宽

最近报刊上不时有“继续新长征”的说法，我想应改为“继续长征”或“进行新（的）长征”。前者是指在过去长征的基础上继续长征，也就是坚持继续革命的意思；后者的“新（的）长征”是对“旧（的）长征”

而言。长征，狭义地说，是指二万五千里长征，广义地说是指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长征。新长征，也就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下来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随着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的召开，以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新长征开始了。要么说“华主席领导我们继续长征”，要么说“紧跟华主席，进行

新（的）长征”。“继续新（的）长征”的说法在逻辑上是欠妥的。（原载《中国语文》一九七八年第四期，转载时有删节）

* * ~~~~~ * *

建议开辟我国测定国际地震的报道领域

国际部 钟 冬

九月十六日二十三点三十五分（北京时间），伊朗发生七点七级的强烈地震。九月十七日早上我们收到不少有关这一消息的外电，并且据此编了消息。消息编好后，打电话到国家地震局进行核对。据告，我国的地震台同样测到了这次地震，地点、时间、震级和外电报道的基本吻合。这一偶然的机，使我们发现，我国的国际地震测定工作已达到了一定水平。于是，我们作了一次尝试，把原来只是转抄外电的消息改写为我们新华社自己的消息，把稿中“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的字样换成“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而在另一段里写上：“美国地震情报站也测出震级为七点七级”。

这则根据新华社第一手材料报道国际地震的消息广播后，我们调查了好几家国内报纸，以及香港《大公报》，它们在第二天都采用了。香港《大公报》在标题上强调：“中国地震情报站录得伊朗强烈地震”。

国家地震局对新华社用中国的测定纪录作为消息来源，感到很高兴。他们来电话表示，今后将主动向我社提供有关国外大地震的测定纪录。

长期以来，国际部很少公开编发国际大地震的消息，少数情况下也只是根据某驻外分社来稿或外电编发第一、第二世界国家测定的消息。好象没有以新华社自己的名义发布过中国地震台测定到的外国大地震消息。现在，我国地震机构测定某些国际地震既然具有一定水平，地震局本身对某些测定又

有确实的把握，这说明可以据此发布消息。我们建议总社开辟这一报道领域。即使目前时效暂时还赶不上外国通讯社（我社整个国际新闻都需逐步解决这一问题），也不必因噎废食。何况此种消息也可以用外电作为左证。世界上一次较大的地震发生后，美、苏、日、英、法、瑞典等国通讯社都相继发布该国测定的消息。今后遇到此类情况，如果再加进一条新华社报道的我国测定的记录，不仅有科学价值，也会扩大我国的政治影响。

我们新华社正在向无产阶级的现代化世界性通讯社前进，应该注意开辟新的报道领域。

以上建议仅供领导上和同志参考。如有可取之处，希望采取措施加以落实，逐步地、有准备地开展这项报道工作。

附：香港《大公报》登的这条新华社消息

全中国地震情报站录得 伊朗强烈地震

【据新华社北京十七日英文电】全中国的地震情报中心录下了昨天十五时三十五分在伊朗中部发生的里克特七点七级的地震。

美国科罗拉多州果尔登的地震情报中心证实了这次地震。

这次地震震源在德黑兰以南约六百五十公里的亚次德。